



选择、博弈与调适:液态社会视域下用户新闻回避行为探析

闻 娱,袁皓冰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新闻回避是新闻业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通过半结构访谈方法,探析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研究认为,用户新闻回避行为表现为优化选择、灵活博弈与自我调适三种形式,其背后的产生逻辑是:其一,在现代社会时间液化下,用户为了增加新闻效能感而选择与个人生活高度相关的新闻,为了对抗信息过载的倦怠感而规避同质化新闻;其二,在现代社会权力液化下,用户为了确保信息消费多元化而积极运用“策展”回避,因媒体公共信任崩塌而选择反新闻规训;其三,在现代社会个体液化下,用户为了构筑信息安全屏障而忽略负能量新闻,在舆论极化的环境中,为了追求群体归属与认同而自我保护地回避某些新闻。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来应对新闻回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树立建设性新闻理念、探索新闻业自我造血模式、完善平台治理、重建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等。

关键词: 液态社会;新闻回避;用户行为;产生逻辑;建设性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4-0163-08

Choice, game and adaptation: An analysis of users' news avoidance behavior in liquid society

WEN Yu, YUAN Haobing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News avoidanc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oncern in journalism. Drawing from Zygmunt Bauman's theory of liquid society and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study explores users' news avoidance behavior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users' news avoidance behavior includes optimizing choices, flexible strategizing, and self-adjustment. The main driving logic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points. First, in the liquefied space-time of modern society, users select highly relevant news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news efficacy and avoid homogeneous news to prevent burnout. Second, in the context of liquefied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users actively employ "curation" avoidance to ensure diversity in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nd choose anti-news discipline due to the collapse of public trust in the media. Third, in the liquefied individuality of modern society, users ignore negative news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safe barrier, and in the face of polarized public opinion, choose self-defense to pursue group belonging and identity. In terms of coping strategies,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exploring journalism's self-sustaining models, improving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reconstructing news theory in the digital age provide feasible approache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news avoidance.

Key words: liquid society; news avoidance; user behavior; generation logic;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收稿日期:2024-06-07 网络出版日期:2024-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077)

作者简介:闻 娱(1976—),女,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理论和媒介文化方面的研究。

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流动的现代性》中,齐格蒙特·鲍曼引入“液态社会”这一概念描述现代性发展至后期的社会形态特征。他指出:“权力从街道和集市、从会堂和国会、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流走,流进电子网络的表层。”^[1]^[6] 这表明,传统的高度集权社会结构正在逐渐瓦解,互联网赋予个体新的权力,但液态的不稳定性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个体孤独感的增加、对即时满足的追求、社会秩序的瓦解、安全感的丧失,以及人们对于生存的普遍焦虑。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重塑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液态社会这一概念不但揭示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更是解读当下新闻领域嬗变的重要视角。荷兰新闻学者马克·德尔兹乃是将“液态”话语从社会学引入新闻业的关键人物。当前,国内对于液态新闻业的研究视角大多延续德尔兹对新闻专业色彩的探讨,聚焦于新闻生产以及新闻职业的变革。例如,陆晔等^[2]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业“液化”的两个特征,即记者身份的“液化”和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液化”。同时,肯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液态新闻生产中依旧具有理论意义和普遍价值。周睿鸣等^[3]结合液态理论中鲍曼对于“共同体”的阐释,在中国新闻业快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提出“液态的连接”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受访者对于职业共同体的“在地理解”。

尽管探讨新闻业及其生产过程的“液化”现象时,坚持新闻专业理念和职业精神十分重要。然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从固态的沉重形态向液态的灵活形态的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背景下,液态现象不仅在新闻生产领域显现,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新闻活动中^[4]。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的新闻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被打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不断重新组合。受众被动接收信息的状态已经被主动选择新闻信息的行为所取代,新闻回避行为便是这种变化的显著表现之一。因此,从液态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用户新闻回避行为,具有较高的合理性。本文立足于液态社会理论,将用户新闻回避行为作为研究焦点,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深入分析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产生逻辑。这一研究旨在补充新闻学领域对液态理论的引用和讨论,展现理论对个体价值的关怀。同时,本文也旨在拓展新闻回避议题研究的宏观视角,弥补该领域质化研

究的不足。这一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在液态社会中,个体如何处理与新闻信息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人们的信息消费模式。

一、新闻回避概念溯源

近几年来,新闻回避这一议题始终热度不减。牛津路透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数字新闻报告展现出当下新闻业迅速变迁的景象。该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受众中,经常或有时刻意回避新闻的比例达36%,相较于2017年上升了7%,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5]。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导致的“创伤后遗症”阴霾在全球范围内久久不散。一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荷兰公民新闻回避情况的调查研究显示,采取新闻回避行为是公民们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之举^[6],可见新闻回避受个人心理状况的影响。

新闻回避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学界。Skovsgaard等^[7]将新闻回避区分了有意和无意两种情况:有意的新闻回避是个体因不喜欢新闻而有意识地减少新闻接触;无意的新闻回避指用户因为更偏好其他类信息而无意识导致一段时间内的低新闻接触。中国学者常江等^[8]强调“回避”二字本身的受众自主性,将新闻回避定义为新闻受众或用户在特定时间内有意识、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关于有意回避新闻的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试图周期性避开所有新闻来源的人,他们在新闻内容出现时选择不看或直接切换;另一类是试图在特定时间段或特定话题上减少新闻消费的人。本文聚焦于有意的新闻回避,在前人文献基础上,将新闻回避定义为在特定社会背景与媒介生态下,新闻受众或用户基于一定心理特征,在一段时间内主动回避接触某类或全部新闻内容的行为。

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逐渐平息后,全球新闻回避的情况却仍保持在较高水平,由此可见,新闻回避的产生除了个人的心理、精神因素以外,还存在其他原因。纵观国内现有研究,对新闻回避行为产生原因的描述主要着眼于媒介技术赋权、网络信息失序等。一方面,信息技术、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等“数字元技术”推动人类迈入全新的社会阶段。在可供性视角下,技术与人形成功能性平衡。如李薇等^[9]指出,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个体不再是李普曼笔下无意识的“最后一排的稻草人”,新闻抵抗与回避行为是他们恢复自我主体性的实践。另一方面,

数字时代媒介生态演变加剧了信息失序,用户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抵抗。王斌等^[10]将新闻回避视为用户为应对众声喧哗的信息环境、优化新闻消费体验而采取的情境化策略。李彪等^[11]关注到,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年轻群体因信息过载而从管理新闻转变为回避新闻的心理与行为。在社交分发与智能算法双重夹攻下,新闻回避似乎成为新闻消费者的时代宿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产生逻辑进一步展开研究与阐释。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用户新闻回避行为。Hermida^[12]提出的弥散新闻概念指出,社交媒体的兴起不仅造成了新闻生产的弥散,也影响了新闻消费领域。在互联网上,网民被大量新闻和信息所包围,他们接触新闻与回避新闻的可能性与程度都在增加。参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3]中关于网民年龄结构的数据,20~59 岁的网民占总体网民的 65.8%。这表明,70 后至 00 后这一年龄段的网民在国内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因此,将访谈对象聚焦于 70 后至 00 后之间具有新闻回避行为的互联网用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别是 Z 世代

的青年,他们的成长环境深度融合了互联网和新媒体,所以本文选取的访谈对象以 00 后为主。此外,为了便于后续分析生理性别是否对新闻回避行为有所影响,本文在选取访谈对象时,确保了男性和女性的数量相等。这样的样本选择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性别在新闻回避行为上可能存在的差异。

在访谈对象的抽样选择阶段,首先,本文运用目的性抽样中的最大差异抽样法。这一方法是按照研究目的来抽取访谈对象,被选中的访谈对象所产生的研究结果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涵盖新闻回避中的各种不同情况。其次,为确保访谈对象与访谈资料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以新闻回避的定义、受访者年龄结构范围、受访者的知情情况与参与访谈意向等因素作为判断标准进行抽样筛选。最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确定了 20 名符合上述判断标准的用户作为受访者。为便于描述受访者,采用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XX”形式来表示具体的受访者。其中,第一位英文字母用“A—D”分别代表 00 后、90 后、80 后与 70 后这 4 个年龄段的用户,第二位阿拉伯数字按顺序从 1 到 20 进行标记。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段、职业、接触新闻的主要渠道以及访谈形式详见表 1。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序号	性别	年龄段	职业	接触新闻主要渠道	访谈形式
A1	男	00 后	在读大学生	微博、抖音	线上微信访谈
A2	女	00 后	在读大学生	微博、抖音、小红书	线上微信访谈
A3	男	00 后	在读大学生	微博、抖音	线上微信访谈
A4	女	00 后	在读硕士	学习强国、小红书	线下访谈
A5	女	00 后	在读硕士	微博	线下访谈
A6	男	00 后	公司职工	微博	线上微信访谈
A7	女	00 后	事业单位员工	微博、抖音、小红书	线上微信访谈
A8	女	00 后	在读大学生	微博、小红书	线下访谈
A9	男	00 后	在读大学生	抖音	线上微信访谈
A10	男	00 后	在读硕士	微博、抖音、小红书	线下访谈
B11	女	95 后	大学教师	学习强国	线上微信访谈
B12	男	95 后	公务员	学习强国	线上微信访谈
B13	男	90 后	个体户	微博、抖音、小红书	线上微信访谈
B14	女	90 后	公司职工	抖音、微信公众号	线上微信访谈
C15	女	80 后	个体户	抖音	线上微信访谈
C16	男	80 后	个体户	抖音	线上微信访谈
C17	男	85 后	事业单位	抖音、学习强国	线上微信访谈
D18	女	75 后	公司职工	头条	线下访谈
D19	男	70 后	公司职工	学习强国、头条	线下访谈
D20	女	70 后	退休人员	抖音、微信公众号	线下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集中在2024年3月至4月进行,总时长约为10.5小时,平均每次个人访谈时长约为0.5小时。在访谈形式的选择上,基于实际情况,采用了线上微信语音聊天和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访谈内容涵盖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媒体用户的日常信息接收情况、被推送新闻的账号和平台、接触新闻的主要时间段、用户对不同类型新闻的态度与心理体验,以及用户在选择“回避”部分或全部新闻内容时所采取的手段和行为策略。在访谈过程中,根据讨论信息的重复性、资料收集的延展性以及受访者的回答意愿,持续评估访谈的饱和程度。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或结束访谈。这种灵活的评估方法确保了访谈的深入性和有效性。

三、时间液化下的优化选择

对于时间的定义似乎不言而喻,从科学的角度和以往的文献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解释时间的概念。首先,它是客观性时间,能够通过时钟等工具被准确测量,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四季循环之中;其次,它是人的主观性体验,存在于人的感受中,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单位;最后,它是社会性时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并随之变化^[14]。媒介的变迁、科学技术驱动使得社会陷入加速的逻辑当中,德国学者罗萨提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亦指出加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在速度挂“帅”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时间与时间观走向异化^[15]。一方面,液态的现代性液化了持续性,持续性失去了价值,“短期”取代了“长期”,短暂性、瞬间性受到关注^{[1]196};另一方面,固态的时间被打破与重置,液态社会下的时间是轻灵与流动的,时间转化为碎片状态。

(一)选择高相关度新闻,提高新闻效能感

对于新闻与传播领域而言,时效性是衡量新闻的标尺。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加速与液化使得新闻业面临更加严苛的时效性要求,传统新闻媒体常规化的新闻生产其时效性已然不能满足当下受众的需求,新闻生产实践愈发走向新闻加速产出与新闻碎片化呈现。“现在是快讯息时代了,看一则新闻30秒的事情,我不会再去看很长的新闻。”(受访者B11)

随着各类新媒体平台的涌现,传播资源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报道密度急剧上升,话题不断刷新和扩充,消息推送频繁,以及新形式的“黄色新闻”泛滥,构成了用户当前面临的困

境。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饱和、新闻超载的环境中,用户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和认知负荷的增加成为了突出问题。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在面对环境中的挑战时,能否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感知或信念^[16]。在新闻消费的背景下,这种效能感涉及到用户是否相信自己能够搜索到自己需要的新闻资讯、解读出新闻资讯的含义、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17]。面对海量新闻,个体为了增强对新闻环境的控制力和提升驾驭新闻环境的信心,会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那些与自己高度相关的新闻内容。这种选择行为反映了用户在信息过载时代,试图通过优化信息筛选来维护自我效能感和减轻认知负担的适应性策略。如从事金融行业的受访者B14表示:“我不爱看长篇、晦涩难懂的报道,偏爱一些简短、主题明确与自己相关的新闻,因为从事金融,像国家政策的颁布会特别关注。”(受访者B14)

在以往的研究中,Edgerly^[18]已验证了新闻相关度与新闻回避显著相关,他们选定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成年人样本,通过测试指出政治兴趣、新闻相关度、新闻效能感是影响新闻回避行为的三个重要变量因素。

(二)规避同质化新闻,实现反倦怠

在液态社会所形塑的新型媒介时间观作用下,新闻爆炸与加速现象必然会引发同质化新闻的问题。目前,新闻的发布大致可分为两类:原创采编发布与转载发布。原创采编发布的授权对象通常仅限于权威新闻媒体以及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新闻网。正因如此,转载新闻成为媒体平台主要的新闻发布方式。这种方式虽能迅速扩大信息覆盖面、提高传播效率并节省媒介资源,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媒体之间新闻内容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在追求速度和广度的过程中,媒体盲目转载新闻,导致新闻冗余与堆砌。算法的加入更是使原本就存在的新闻同质化问题愈发突出。用户浏览新闻的行为被算法机制记忆,并生成用户画像。在用户画像的精准指引下,用户不断接收到主题、类型与内容雷同的新闻,从而被动地陷入“信息茧房”。过量的同质化新闻犹如噪音,用户对相似新闻的兴趣逐渐下降,进而产生新闻倦怠^[19]。选择规避相同的新闻内容以节省自身注意力,成为用户反倦怠的行动策略之一。“像杭州的亚运会期间的获奖情况、同一个运动员成长经历的报道我刷到过很多次,内容基本重复。”(受访者A4)70后受访者同样谈到:“一般相同的新闻我不会选择再看,有些浪费时间。”(受访者D19)

四、权力液化下的灵活博弈

鲍曼^{[1]38}认为,现代性所体现的权力以及早期批判理论所关注的,是一种极权主义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人们仿佛被囚禁在“全景监狱”中,被迫聆听管理者的声音,而“福特主义的工厂”则将人类活动简化为机械重复的动作。然而,随着社会进入液态阶段,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权力的指向转向了自由流动和边界的消融。在现代性的稳定时期,那种“全景监狱”式的权力管理模式已被“共景监狱”式的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新模式下,权力不再被局限在物质的司法机构中,而是渗透在多样化的纪律技术和手段之中^[20]。随着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演进,传播权力进一步下放,普通大众成为了积极的信息策展者和管理者。与此同时,各种权力掌控者开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用户施加影响、刺激和诱惑,构建起一个多方博弈、争夺用户注意力的新型权力关系空间。这一变化标志着权力运作的去中心化,以及个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性增强。

(一)积极运用“策展”回避,信息消费多元化

“策展”的英文表达为“curation”。2013年前后,强调信息过滤、分析以及整合呈现的策展新闻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便于网民和新闻记者对网络信息进行策展的网站大量涌现,例如 storify.com 和 scoopit.com^[21]。新闻生产的去中心化以及把关的去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原有的新闻传播权力格局,使得新闻职业与非职业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用户获取新闻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自数字时代以来,“策展”愈发成为用户连接网络社会的中介。Davis^[22]在2017年将新闻与传播策展划分为生产型信息策展和消费型信息策展。前者聚焦于数字媒体上人们的自我呈现、隐私维护等行为,其依赖于数字媒体平台所提高的社交可供性,比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分享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设置特定可见范围等;而后者则将用户视作积极的信息接受与参与主体。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在何时、从何平台、向何人获取信息,或者忽略信息。同样,用户可以因为感兴趣而浏览某一条或者某一类型的新闻内容,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规划和调整信息流,利用灵活的信息策展来筛选、过滤、回避新闻。不同的受访者也会选择不同的“策展”回避手段。“我会特意在刷到消息的时候点击不感兴趣,让互联网减少有关账号的推送。”(受访

者 A6)“在抖音上面刷到可能直接划走忽略而不是特意点击屏蔽键。”(受访者 B13)“我会自己在手机设置的消息通知里关闭那些会推送大量新闻的软件。”(受访者 A10)根据访谈结果整理,用户最常用的新闻“策展”回避手段包括但不仅限于忽略新闻推送、屏蔽新闻账号、直接卸载推送新闻的软件。

此外,用户的信息消费行为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新闻领域并非静止不变,根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它始终与文化、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相互交织和互动,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随着资本权力的不断扩张,泛娱乐化趋势和流量经济正在解构传统的专业新闻生产实践,常规的新闻产品逐渐被更具刺激性的娱乐性内容所取代。在高度媒介化的环境下,伴随着智能手机和电脑长大的“Z世代”,其消费观念更加倾向于娱乐化,他们更加重视体验感和趣味性。这一代人的信息消费模式,正在重塑新闻场域的生态,推动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与变革。如00后受访者 A5就表示:“我不爱看新闻,在生活中我其他更加轻松的娱乐方式,像磕cp,打游戏,这些更能让我快乐。”(受访者 A5)

(二)公共信任崩塌,反规训姿态入场

在互联网构建的新型权力关系空间里,新媒体迅速崛起,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当下它也成为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滋生与快速传播的温床。部分账号一味地追求博人眼球,毫无底线地追逐流量,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制造虚假、低俗、夸张的内容。技术在提升新闻生产效率、为新闻价值增添砝码的同时,也激化了新闻行业中内容虚假、文献编造、信息泛滥、伦理偏差等问题。上述种种情形加剧了新闻生态的恶化以及传播秩序的破坏,更使得用户对新闻业的信任陷入危机。

不仅如此,一些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在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紧跟互联网时代的节奏,一些主流媒体在追求时效性的过程中,可能会不自觉地陷入到一种被时间逻辑所主导的怪圈,导致新闻内容出现异化。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新闻时,部分媒体可能会出现失语、延迟报道等现象,这种新闻监督的缺位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例如,在2022年3月22日,CGTN过早发布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消息,这一行为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和诟病。这表明,在追求新闻时效性的过程中,如果牺牲了新闻的真实性,那么即使是权威媒体也会遭到公众的质疑。又如,《每日人物》发布的关于MU5735航班

的报道,也因为不合时宜、对遇难者家属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等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有些媒体会带有博热点的感觉,真真假假让人不敢轻易下判断,一些很陈旧的新闻重新包装再次发布的情况司空见惯,但令我愤怒的是有些官媒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于我而言我希望看到报道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新闻当事人也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受访者 B12)

另外,亚文化价值体系与主流价值体系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相互碰撞与交融,形成了话语规训与反规训的复调景观。就西方人际交往来说,互联网是现实交往的放大和延伸;而对于中国人际交往而言,其具有的高隐蔽性与高匿名性促使人们释放情感,因为在网络上,面子、礼节和权威等现实压迫不复存在。中国互联网上的部分网友以反规训的姿态参与其中,话语行为充满反叛的情感能量^[23]。在逆火效应的多重影响下,用户对媒体的公共信任开始调整,从主动接触新闻转变为被动偶遇新闻甚至逃避新闻。

五、个体液化下的自我调适

(一)构筑信息安全屏障,忽略负能量新闻

早期的批判理论对现代社会中人主体性的剥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将人的解放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然而,鲍曼在反思中提出,在流动的社会中,人的解放并非简单的幸事。他指出:“在流动的社会中,人的解放是一件复杂的幸事,前所未有的主体自由与随之而来的危机和风险并存,人们急切地寻找确定性,以消除怀疑、恐慌和不安。”在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新闻报道在处理风险和突发危机时,往往以冲突为导向,而社交媒体更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煽情的文字、刺激的画面和充满情绪的标题,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来吸引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

共情,即一个人能够理解并回应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的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24]。一些用户在阅读这类新闻后,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共情感受,感到情绪低落却又无能为力。在这种心理矛盾的双重压力下,为了避免情感受到更大的伤害并增强自身的安全感,他们选择回避这类新闻,作为构筑个人信息安全屏障的一种措施。这种回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自我保护和心理调适机制。“其实我对巴以冲突这样的国际新闻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但微博、抖音有些画面过于血腥,只能

选择屏蔽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受访者 B14)受访者 A4 同样认为:“我是一个容易被新闻带动情绪的人,尤其是灾难类的新闻。为了避免在现实生活中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会刻意的不去看。”(受访者 A4)

(二)追求归属与认同感,舆论极化下的自卫

鲍曼^{[1]310}用“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来形容液态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短暂且脆弱的连接。人们在观看演出时身着统一的服装,从而获得短暂交集,而演出结束后又回归原貌,匆匆消失在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中。他形象地指出,当今整个社会存在强烈的原子化趋势,人们精神生活匮乏。为缓解这种倍感孤独的精神状态,大部分人投身于虚拟网络,以寻求认同感与归属感^[25]。数字媒体平台作为幕后推手,基于个人的价值与立场持续将网络用户划分成不同群体,进而导致舆论极化和信息茧房的产生。在大型舆情事件中,各方相互驳斥,坚定地相信内部观点,拒绝、回避接触带有其他观点的报道。在后真相的裹挟下,用户情绪不断流动,极端负面能量爆发后,恶性网络暴力事件频繁滋生。沉默的螺旋循环加剧,处于劣势的用户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在线下寻找可信的信息源,甚至选择媒介迁移,转向更多以娱乐信息为导向的领域。“我比较排斥讨论声音很激烈新闻,官方没有出示明确的结果,在那些词条里面只有无尽的网络骂战,我更愿意相信我亲眼看到的或者我周围人的亲身经历。”(受访者 A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归纳出液态社会下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产生逻辑,如表2所示。鲍曼的理论将“液态”这一概念应用于社会形态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描述。在社会层面,它涵盖了时间的特征和权力的运作方式;而在个体层面,则涉及到人的精神、情感和社交网络。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时间、权力和个体的液化三个维度,与当前新闻生态系统中新闻的生产、传播以及用户端的变化相对应。由此可见,引发新闻回避行为的机制是相对完整的。

对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分析,不应仅仅停留在将其视为一种反对连接的戒断实践或媒介策略上。这种行为实际上为整个新闻生态系统乃至社会格局的变化敲响了警钟。同时,对液态理论的探讨也不应局限于新闻生产或职业范式的转变。液态的不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化性对宏观的社会领域和微观的个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用户在新闻活动中的变化和需求转变,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人文关怀、辩证性和历史性的角度,审视新闻学在数字化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和机遇。

表2 液态社会中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产生逻辑

液态社会	新闻生态系统	新闻生态表征	用户的新闻接触心理或状态
时间液化维度	新闻生产传播端	新闻加速、新闻碎片化、 新闻超载、新闻同质化	新闻效能感降低、新闻倦怠感加剧
权力液化维度	新闻生产传播端	新闻职业边界模糊化、新闻 传播渠道多元化、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 互动博弈、新闻官方权威瓦解	新闻管理自主化、信息消费多元化、 新闻信任度下降
个体液化维度	新闻用户端	冲突性报道不断、新闻泛娱乐化、 新闻舆论极化加剧	共情负能量新闻后产生负面情绪， 在新闻争论下观点两级化、情绪极端化、 个体沉默化、注意力转移

六、结 语

新闻回避作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从本质而言,它反映出数字新闻领域的用户群体在面对新闻与新兴媒体技术相融合之际所产生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用户期望能够迅速检索到具有价值的新闻内容,然而却不希望被冗余新闻以及负面新闻所困扰;另一方面,在技术赋予权力的情况下,个体能够灵活地管理和调整新闻消费,借助各种反连接的方式打破将“连接视为一切”的旧规。

本文借助鲍曼的液态理论,深入探究了用户回避新闻行为的产生逻辑。首先,在现代社会时间感知的加速与液化背景下,用户为了缓解认知负担、节约宝贵的注意力资源,选择了回避策略。这不仅提升了他们处理新闻的效能感,也实现了对信息倦怠的有效反击。其次,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演变中,原本被动的受众转变为积极参与的用户。他们追求更高质量的新闻消费体验,并转向多元化的“策展”实践,以满足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在这一新型权力秩序下,传统新闻权威体系正逐步解体,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力在减弱,用户对新闻行业的信任度也在下降。冷漠、失望、质疑和反叛心理驱使一些用户开始回避新闻内容。第三,在充满风险的社会中,冲突性报道和新黄色新闻充斥互联网,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虽然享有空前的自由,却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为了避免在共情作用下遭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伤害,回避新闻成为了个体构建信息安全屏障的手段。面对“衣帽间共同体”下的孤独与空虚,许多人转而投身网络,寻找群体归属感,不同圈层间的新闻壁垒由此建立。

诚然,新闻回避行为作为一种反抗策略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不利于整个新闻生态的发展,也不利于公众的社会参与和文化认同。对于新闻业而言,其作为“真相标志物”“历史的初稿”以及“公共

文化档案”的地位遭受极大冲击^[26]。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回避”意味着不关心和脱轨,长期的新闻回避实际上危及了社会公共性的培育以及正确文化和价值观的涵养。在应对路径方面,首先,本文认为,包含“积极”“解决”等建设性理念的本质逻辑蕴含着对抗回避的意味^[27]。“建设新闻”的六个特征,即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核心功能、激发积极情绪、记者干预以及以未来为导向,深刻表明新闻媒体应当转变常规的冲突性报道思路,选择更为积极正面的报道形式,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参与感和信任感。其次,新闻业应推行“差异化”思路,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在新兴数字媒体技术的助力下,新闻报道的视听呈现需针对不同用户群体,注重输出与表达的差异性。例如,对于年轻用户群体,适当转换和运用网络热词能够迅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消除圈层隔阂。坚守初心、秉持新闻专业主义、遵循内容为王的原则是提高媒体自我造血能力的关键,激发新闻机构内部活力方能避免同质化传播。再次,面对网络空间信息失序的现状,社会治理与平台整顿行动迫在眉睫,只有营造一个健康、文明、清朗的网络环境,才能恢复用户的正确认知与判断。最后,除了新闻业界的努力之外,新闻学界也应进行更多关于构建数字时代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学理性思考,以便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工作。比如,重新思考建立有效的新闻事实核查机制,以平衡快速传播时代信息的准确性与速度;又比如,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其在人与新闻的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由于访谈样本选取的局限性,本文归纳的用户新闻回避行为的产生逻辑有待进一步深入。在对访谈结果的整理中,笔者发现Z世代用户的新闻接触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他们偏爱简单和轻松的新闻内容,对于主流新闻的情感动员和网络规训持有更强的反叛态度。此外,受生理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女性回避灾难类、战争类等新闻的频率普遍高于男性。以上两点或许能够揭示数字环境下不同用户新闻消

费的特征,为完善不同群体新闻回避行为产生机制的研究提供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2] 陆晔, 周睿鸣. “液态”的新闻业: 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 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23(7): 24-46.
- [3] 周睿鸣, 徐煜, 李先知. 液态的连接: 理解职业共同体: 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7): 27-48.
- [4] 李泓江, 杨保军. “液态”理论旅行及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9): 254-261.
- [5] Newman N, Fletcher R, Robertson C, et al.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3[R/OL]. (2023-06-01)[2024-06-07].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3-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3.pdf.
- [6] Kiki B D, Yael H D, Rens V, et al. News avoidanc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1, 9(9): 1394-1410.
- [7] Skovsgaard M, Andersen K. Conceptualizing news avoidance: Towards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ause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1(4): 459-476.
- [8] 常江, 李思雪. 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回避: 内涵、逻辑与应对策略[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9): 100-109.
- [9] 李薇, 白宇. 智能传播时代的新闻回避: 原因、影响与重构[J]. 青年记者, 2023(1): 60-62.
- [10] 王斌, 黄婧. 情境化策略: 新闻回避的实践形态、媒介动因与生成机制[J]. 当代传播, 2023(2): 4-9.
- [11] 李彪, 张雪, 高琳轩. 从管理新闻到回避新闻: 社交分发环境下新闻消费方式的转向[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9): 23-38.
- [12] Hermida A. Twittering the news: 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0, 4(3): 297-308.
-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4-03-22)[2024-06-07]. <https://www3.cnnic.cn/n4/2024/0321/c208-10962.html>.
- [14] 王海燕. 加速的新闻: 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工作的时间性变化及影响[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10): 36-54.
- [15] 刘艺, 袁健红.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 社会加速理论[J]. 浙江学刊, 2024(1): 157-165.
- [16]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 [17] 仇筠茜. 再造信任: 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回避的路径与应对策略[J]. 新闻与写作, 2023(7): 16-25.
- [18] Edgerly S. The head and heart of news avoidance: How attitudes about the news media relate to levels of news consumption[J]. Journalism, 2022, 23(9): 1828-1845.
- [19] Song H, Jung J, Kim Y. Perceived news overload and its cognitive and attitudinal consequences for news usage in South Korea[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7, 94(4): 1172-1190.
- [20] 朱振明.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9): 32-37.
- [21] 邓建国. 筛选与呈现: 信息疲劳背景下的移动内容传播新趋势: 以雅虎新闻摘要与 NYT Now 为例的分析[J]. 新闻记者, 2015(6): 16-24.
- [22] Davis J. Curation: A theoretical treatment[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7, 20(5): 770-783.
- [23] 黄月琴. “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训: 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69(5): 114-118.
- [24] 吴飞. 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5): 59-76.
- [25] 甘露, 关博韬. 液态社会视域下虚拟趣缘社群的情感互动: 以全民 K 歌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2): 146-153.
- [26] 常江. 作为媒介抵抗文化的数字极简主义[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12): 83-92.
- [27] 殷乐, 申哲. 数字生态下的新闻选择: 建设性视域下新闻回避的内涵逻辑与应对路径[J]. 青年记者, 2023(5): 9-13.

(责任编辑: 唐亚蕾)